



无可救药的  
德意志  
右翼的命运  
与经历

〔奥〕彼得·西施罗夫斯基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无可救药的德意志

## ——右翼的命运与经历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 著

赵怀宇 译

王炳钧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可救药的德意志：右翼的命运与经历/（奥地利）西施罗夫斯基  
（Sichrovsky, P.）著；赵怀宇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9

ISBN 7-5001-0435-9

I. 无… II. ①西… ②赵… III. 德国-现代-新闻采访  
IV. D751.6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0092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邮 编/100810

责任编辑/林 燕

责任校对/陈 洁

封面设计/常燕生

印 刷/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5.25

版 次/199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1996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7-5001-0435-9/H · 154

定价：5.60 元

## 出版说明

近年来，死寂多年的纳粹思想在德国沉渣泛起，新右派活动频繁，甚至酿成暴力，新闻媒介对此的报道屡见不鲜。纳粹能否在德国东山再起，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本书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却别辟蹊径，以访谈录的形式从另一角度揭示和探讨德国新右翼浪潮产生的原因。作者只如实记录采访内容，不作任何评价，试图用被采访者自己的话来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动机，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

作者是二战期间在德国纳粹集中营受害的犹太人的后裔，现为奥地利著名新闻记者。他曾以同样的访谈形式，出版过对纳粹子女的访谈录、对德国犹太青年的访谈录等。这些著作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德国以外的国家出版，引起较大反响。我公司曾在1994年翻译出版过他的《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

作为记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具有敏锐的新闻头脑和卓越的采访技巧。他的采访录往往会使人从全新的视角和更深的层次看问题。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在世界变得愈来愈小的今天向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给读者更多的启迪。

编者

1996年4月

## 前 言

人丧失了悲痛的能力之后难道连欢笑也不会了吗？如果说，德国人历经几十年紧张的道德再造，在统一前后的数周内表现得轻松而快乐的话，那么统一之后不久，他们脸上的笑容便凝住了。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始小心翼翼地人民、国家、民族这些有沉重历史负担的概念看作褒义词，一股从右边刮来的既新又老的阴风就向着欢乐的统一气氛直扑而来。

已被遗忘的场面充斥每天的电视和报纸新闻报道：行希特勒礼的嚣张青年，警察与极右分子的街头大战，燃烧着的避难者住所和外国人住宅，被毁坏的墓碑。这一隐蔽思潮突如其来爆发使得德国，尤其是海外各国震惊了。这些场面让人回想起历史书上记载的那些人们本已忘却，现又重新出现的场面。

焚烧外国人及避难者住所事件首先激起了很大一部分群众的震惊和愤慨，他们的这种反应或许也是出于自身的无助。绝望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反抗与寻找罪责；现实事件类似当年，那么现在的人类与当年是不是并无二致？我们与当年的人相比是不是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自发建立起来，它面临的敌人企图依照第三帝国的原则建立一个第四帝国。

到处都在提醒人们昔日很可能卷土重来。对即将来临的新法西斯主义的预言常常像广告，其方式有时简单得可怕。那些预测民主即将终结的人恰恰不愿承认，在德国历史上还从

未有过如此广泛的自由，让他们可以公开散布这么多的谬论。

但人们从未认为“右翼分子”是政治敌人，而是把他们指控为刑事犯和愚蠢的危害公众的个体，认为其行为始于纵火，终结于奥斯威辛，因而把问题的解决推给社会的上级部门，推给执政者、警察及法律部门。如此看来，大部分批评新“右翼分子”的人把这些骚乱的责任推给国家，便不是事出偶然了。他们只期待上面出来保护自己的臣民，似乎不觉得自己也应为国家的政治气候负些责任。来自“右翼”的危险的争论滑稽地转变成了左翼要求一个铁腕国家的呼声。

这些殴打外国人、焚烧避难者住所、毁坏犹太人墓地并称自己为“右派”的“家伙”，就现在的法律来看，是违法者，所以，解决这一问题，保护这个国家安分守法的公民免遭违法之徒的侵犯，是国家的任务。

“非右翼分子”要求法治与秩序，感到自己的安宁受到了干扰，如同“右翼分子”感到自己的安宁受到了外国人的干扰一样。两者都感到被国家抛弃，都要求有一个“铁腕国家”。所有参与者都要求新的法律，要求严格禁止右翼组织，要求“禁止进口”外国人，要求一个新的避难法。而双方都没有看到，这些冲突的根源在于政治和社会问题，是不可以作为刑事问题来对待的。

德国政治上的右翼运动从来就不是那么简单地仅仅涉及到几个嚣张的青年及一些怀旧的人。并不是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把他们关起来就没事了。

近百分之十的选举结果表明，右翼党派有新的支持者，选民完全出于实际的考虑投了他们的票。

不认识到德国的这一“右翼”潜力，重犯两次大战之间

的悲剧性错误，把右翼运动简单地称为恶魔，却不在政治上严肃对待它，这便意味着，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卡尔·史劳斯说过：“谈到希特勒，我无话可说。”这听起来虽然很独特，却使人想起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那种具有致命后果的熟视无睹的态度，他们起初嘲笑纳粹分子，但对他们的政治口号却视而不见。

如果“防患于未然”这句话还有意义的话，那么对于那些把反对右翼运动的斗争视为迫不急待的自我表现机会的人，它首先应该是一个警告。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公开的傲慢更有助于政治敌手了。

前不久，德国一家电视台播放了一个很短的电影，演的是一个画着希特勒面孔的鸡蛋被砸碎，随后出现了一个口号：别让这种“傻子”当权。

如果今天的艺术家以如此原始的高傲来反对一个政治上的右翼运动，并认为与那些“愚蠢”的右翼分子相比，自己很“聪明”，那么我便不明白，我们究竟怕谁呢？如果要提醒大家警惕新法西斯主义的话，那么首先应当提醒人们，把纳粹分子推上台的正是德国的所谓“知识分子”。格林及其同伙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们的帮手也同样如此。他们当中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比当今的艺术家及知识分子所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如果德国的“右翼分子”始终仅仅是一帮刑事罪犯和傻瓜的话，那么便有理由怀疑德国人的平均智商了，因为他们的先辈曾以绝对多数支持了纳粹分子。

过去数月中让我震惊的画面及言辞太多太多，作为关注者，我显然会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新右翼分子如同“当年”的那伙人一样，是对社会、政治安定的威胁。

但光是看到少许画面，远远不能使我满意。我想知道的是，隐藏在右翼倾向背后的是什么思想、什么理由。一个年轻人袭击外国人的动机是什么，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在选举时投极右党派的票。

从为撰写此书所作的第一次访谈中，我很快就看出，“右翼”思想在社会中的传播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近年来，在有关外国人、要求避难者及重新评价纳粹罪行责任等敏感话题的讨论中，“右翼”立场在那些既不属于年轻打砸抢者也不属于怀旧者的人群中也获得了市场。一个思想上的“中产阶级”已经形成，他们以前想的可能与今天没什么两样，只是没有说出而已。

所以必须严格限制采访对象，这比我从前写在德国的犹太青年及纳粹子女等书时，要困难得多。当你就避难等时事政治问题进行采访时，也会在小城镇的社民党代表、工会干部、以自由开明著称的记者及牧师身上发现这些“右翼”思想。

因此，以下所选择的采访对象并不限于那些可能对这一或那一问题持“右翼”思想意见的人，而是在从“极左到极右”的政治态度中自认为持从“中间派右翼”到“极右”立场的人。

这一问题在一开始时便向他们提出，只有当他们以某种方式称自己为“右翼”时，才进行采访，即以此为前提。这种自行划分常常并不十分准确，许多人认为自己“偏右”或“绝非左派”，或者试图说明，由于其他党派的错误，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票投给一个“右派”党，但他们肯定不是“新纳粹”。



许多人所持的只是一种防卫态度，他们反对被他们称为“左”或“自由”的一切。只有少数人公开认同某一明确的“右翼”意识形态。这类人主要是那些“右翼”知识分子，他们的喉舌是在弗赖堡出版的周报《年轻的自由》。这里所产生的的是一个新生的、思想上的“右派”，为避免与“极右分子”相提并论，他们采取极为谨慎的方式，尝试作为能被新的意识形态所接受的谈话对象。这些“新右派”认为他们所持的立场是捍卫民主，与“新纳粹”根本不沾边，他们所崇敬的是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及其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右翼思想家”。

被采访者的政治信仰和动机多种多样。一个感觉受到国家和学校内过分强大的左派势力压制的教师，一个邻居几乎只剩下外国人的退休妇女，几个倍感无聊，而且仇恨成人世界所有事物的青少年，一名右翼党的干部，一个失去了儿子的父亲，等等，等等。

他们所有人的共同点是：不谈论构成他们信仰动机的思想、政治理论及未来构想，而是描述对他们产生影响的经历和印象。几乎所有把自己列为“右派”的人都说，是他们所生存的城市、住宅、工作单位、家庭、学校的状况迫使他们产生了“右翼”思想。

原因总是来自外部的影响，是对不可忍受的境况作出的反应，是绝望之举，是报复的需要。

如果要谈在所有这些采访之后我的整体印象的话，那就是，“右翼分子”几乎总感到自己是环境的牺牲品，大多数人甚至表示，如果“情况”“好转”，他们将改变自己的看法。

我与一个奥地利和一个德国女记者共同采访了大约五十

人，这里发表的是其中的十一人。

他们大多数人不是为了重建旧秩序，而是为了改变，有时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在考虑应该如何对付他们时，也应考虑到这一点。这里所存在的是一种实际感觉到的不公，一种绝望、一种对他人的仇恨、一种常常完全被当作侵略性而发泄出来的恐惧。

除了“思想”上的新右派和因不满而表示抗议的选民的潜在力量之外，还有许多青少年对现行社会具有一种非政治性的仇恨。导向危机、希望危机，加上用右派口号进行挑衅，攻击外国人和避难者，这一切促成了青少年新右翼运动的产生，而对此没有人真正有办法，即使进行有关安分守法的正反两方面道德说教和训导也无济于事。

就近来的经验看，训导式的说教是无法让青少年遵纪守法的。如果我们不承认青少年的行动主义有其现实的根源，这些右翼“嚣张派”就可能被某种目的所利用，成为暴力的后备军。

此书是人们不同命运的一种随意的汇集，它既无代表性，也不展示德国右翼状况的全貌。但我希望，它能从整体上及不同的方面对德国当今的现实作出让人们能够理解的介绍。

我试图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来表明，在当今德国，属于政治右派的，不仅仅是那些所谓的“小人物和青少年施暴者”，不仅仅是那些“傻瓜”和“怀旧者”。谁要是躲在这些语汇之中，谁就不能认识到右派的政治潜力。

这听起来虽然会让人感到有些混乱，但在民主社会中，一定比例的人投右派的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完全正常的发展，由此而得出民主即将终结的结论，便意味着把自己的

不稳定视为现实，并为此而感到害怕。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运动是民主多数派的义务。而一个民族也必须在它发展的某个阶段获得聪明才智、民主的安定以及自信，而不是每次风一来，就担心房子会塌下来。

那些喋喋不休地谈论德国的民主受到威胁的人，所传达的是他们自己的不知所措。他们提醒人们警惕的极端主义的潜力，可能正是他们自己所具有的。只有当德国不是在每次政治动乱时都担心跌交，而是让自己的人民以及国外相信，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对这里的民主构成威胁时，这个国家才能让人信任。

如果此书的内容能对那些严肃投入反对不断增强的“右翼运动”的政治斗争的人有所帮助的话，就已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

## 目 录

前言.....	1
一位教师, 35岁 .....	1
汉娜, 17岁, 女, 好战者 .....	20
一位母亲, 29岁 .....	35
西格弗里德, 18岁, 择业目标: 看守 .....	46
海尔塔·B., 62岁, 居民委员会倡立人 .....	61
一位干部, 48岁 .....	76
威利·D., 65岁, 城市的护卫者 .....	91
曼弗雷德, 18岁, 向往异地的囚犯 .....	104
一位大学生, 26岁, 从左派纳粹转变为右翼保守派 ..	115
一位父亲, 36岁 .....	129
斯特凡妮, 25岁, 受骗者 .....	140

## 一位教师，35岁

我的父母看起来就像人们心目中的模范和权威人士。父亲有一头开始发白的头发，长长的，满嘴络腮胡子，穿着一件磨旧了的灯芯绒外衣，嘴里衔着烟斗，脚下踩着一双看上去足有十年历史的鞋子。母亲是一头染成红色的短发，穿着花外衣，我想是南美货，十个手指肚上嵌着一大堆戒指，可能是印度那边的东西。直至今日，他们仍像从六十年代相册里走出来的人物。那时他们已经成人，参加了当时所有的运动：反抗父母、披长发、留胡子、吸大麻、用毒品、自由性爱、反权威教育、吃绿色食品和自然饲养的鸡肉、按左派思想改造社会，所有这些都跟着做了。

他们的所作所为我都能理解。我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到今日为止也不过是一种普通的代沟而已。只有一件事，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楚：三十年了，他们的举止行为竟然一点儿都没改变。

我父亲多年以来一直在一家左派律师事务所内任律师，不论谁和当局发生了麻烦，只要在意识形态上站得住脚，就

能到那里委托他们辩护。

正如他一贯声明的那样，当时是一场反对他父亲，即我祖父的斗争。祖父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从这一代到下一代，一切都在轮回。祖父是右派，儿子是左派，孙子又是右派，那么，我的孩子又会变成什么样呢？战争结束时，我父亲还不到十岁，这个年纪还无法理解各种事情，但所发生的一切足以在他头脑中留下印象，使他一生都无法摆脱。

他的父亲是个工业家，但不是独立的老板，而是一个经理，总是高踞在大企业的上层。第三帝国时期，他经营着一个兵器康采恩。战争结束后他曾被禁止工作，但只是很短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活跃在大工厂的董事会里了。

祖父十年前过世。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是这个充满卑躬屈膝的人的国家中的一根中流砥柱。我想首先是他的自信和人格影响了我。但这些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父亲是一个和祖父类型相似的人，身材高大，耿直、铿锵，但在思想形态上，却走上了与祖父相反的道路。

当把这两个人做比较时，我很难站在父亲一边。假使给这两个人打分，按十分制，我肯定会给祖父一个满分十分，而父亲的得分绝不会超过五分。

我父母一生都想向自己的孩子证明，他们属于新一代，好德国人将从他们这一代开始。

这些良好意愿的结果却是我们的不知所措，一塌糊涂。我和我的两个兄弟承受不了过多的试验，成了造就新的安分的德国人这一实验的牺牲品，我们成了人们作实验的耗子。那么，我们对新教育模式、新饮食结构以及新授课方法是如何反应的呢？

回头来看，我不得不说，这种反权威教育为战后那些缺乏保障感的孩子提供了乐园。但他们并没有帮助我们这辈人做好应付生活的准备，而只是阻碍了我们。

幼儿园的事情至今仍是我记忆中唯一的恶梦。那些脸上永远挂着微笑的阿姨从来都不清楚什么时候应该干预，什么时候不该。我们往玩具上撒尿，她们只是笑一笑；我们把另一个孩子打得半死，她们只会更友善，随口警告两句就算了。我们把饭菜扔来抛去，她们只会微笑着把东西重新拾掇一遍。家长会只是没完没了地讨论男女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最后以那些人尝试随意交媾而告终。因为，他们认为自由性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我是1958年出生的，正好赶上这段时期。我父母参与建立了市里第一所幼儿园。我只是模糊地记得：那是一间很简单的屋子，地板上放着床垫。玩具被排斥在外，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物体，特别是那些有益于思维创造力的玩意儿。木块、刷子、颜料、纸张。大孩子往小孩子身上画，年幼的孩子出于对年长一些孩子的恐惧，只能听凭他们恣意妄为。

之后我上了学，看到新的左翼精英渐渐取代了老一辈的教师。我对中学的记忆就是老师之间明争暗斗以及我父母的不断介入。

老师不管教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只希望尽可能以最好的分数顺利圆满地完成学业。但我父亲总自以为是地想把他的那套政治斗争思想转嫁到我身上来。

我还记得，历史老师把纳粹分子和斯大林的手下作比较，并把斯大林和希特勒当作二十世纪最坏的两个罪犯时，我回家以后向家里人述说时的情景。

吃饭的时候我问父亲，老师这么说对不对，我父亲从未对斯大林作过任何评论，我那时 14 岁，整天读的都是关于纳粹时期的书和评论。人们从未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或意识形态来谈论，东方的“同志”被视为必不可少的恶棍，以与西方的坏人抗衡。

我父亲勃然大怒，从桌边跳起来，由于过分激动而咳嗽不止。

太典型了！他喊了起来，这就是你们学校里的反动教师！你们老师想通过和斯大林的对比来减轻自身的罪责！这是篡改历史，这种事情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作为父母也是有政治权利的！

他愤怒已极，第二天就找到了校领导，告发说历史老师是个伪装的纳粹，想把国家社会主义那一套东西灌输到学生脑子里。最后的结果就是全校老师对我同仇敌忾，我的生活变成地狱一般。

每当提及德国的历史问题时，历史老师就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我发难，他问我，是否他的评论还跟得上新思想，他可不想再被人当成新纳粹，他的课上不应该再出现那些对东欧大屠杀必要的批判。同学们都笑起来，我却羞得恨不得钻到地缝里。

学校的日子越来越无法忍受，我父亲因物理老师在提到爱因斯坦时说他是一个犹太人科学家，就向他提出抗议，他把这看作是典型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反犹观念。他向校领导要求，让我们班参观集中营。

他给部长写信，向部长抱怨说我们的德语老师把伯特·布莱希特称作共产党人。布莱希特虽说是个天才，但在历史



评论方面政治观点十分片面。

我不再在家里谈论学校的事，但他们又找到了其它途径打探消息。他们和我同学的父母联系，组成了一个反对老师的斗争团体，并且从同学中培养战士，而不是提倡自我责任感。

我当时心里对父母真是怒火中烧，直至今日，我与他们的关系依然不好。我母亲当时是市剧院的戏剧编导，在政治上她总是和父亲立场一致，没有任何分歧。他们只为男女关系的问题吵架，谁和谁在一起了，为什么那么做等等。一切都是公开的，没有嫉妒，至少理论上没有。如果其中一个一晚上没回家，另一个就会一星期都生气，又开始没日没夜地谈论婚姻中占有和自由的问题。这一切都毫不回避我们孩子。我们应该面对现代婚姻的日常难题。

父母还把我带去参加示威游行。我手里举着红旗，喊着“胡一胡一胡一志一明”向前走着。还在听到睡美人的童话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国际歌的歌词了。当他们在烟雾腾腾的小酒馆里开他们的碰头会，赞美古巴的自由时，我就坐在母亲的怀里。我父母在被子下面折腾时，我可以在边上看图书。还从未有人像我们这样自由过。

我母亲总是带我上剧院，那些剧目无一例外都带有政治性内容。过了很久我才开始理解它们，然后便觉得索然无味。三分之二的戏演的是第三帝国，里面全是受害者和迫害者。每场演出都是为了世界革命和反省行动作准备。有一次我在学校的一个朋友那里看了一出彼得·亚历山大的戏剧，感到十分惊奇，原来人也可以娱乐，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而笑，只是单纯娱乐，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一个纳粹出现在舞台上，杀